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六八期 ——

（二〇〇四年二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02a）

【动态报导】太阳为何不落山	
—— “八九点钟的太阳”记录文革世代心路历程	曾慧燕
【春秋史笔】受难者和暴君	王友琴
【历史资料】关于林彪的几个问题	聂荣臻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动态报导】

太阳为何不落山——“八九点钟的太阳”记录文革世代心路历程

• 曾慧燕 •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当年著名的“最高指示”。来自中国大陆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士，对此不但耳熟能详，还能倒背如流。

由卡玛（Carma Hinton）、高富贵（Richard Gordon）和白杰明（Geremie Barme）联手推出的文革启示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最近公映，在海内外掀起对当年红卫兵运动的反思热潮。此片名正是取自上述“毛语录”。不熟悉中国文革史的西方人士，可能对《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片名莫名其妙，但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文革世代”，则心领神会个中三昧。片中那些当年叱咤风云的老红卫兵追悔和无奈的镜头，再度呈现历史的血色面目，重新唤起人们对那已经逐渐朦胧远去的疯狂历史的回忆。

卡玛等人曾执导反映1989年六四事件的纪录片《天安门》，现在再次推出文革启示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以下简称“太阳”）。全片长约两小时，片中以丰富的影视素材，追随新中国同

龄人的足迹，从意识形态和心理状态入手，以个人故事和三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为主要线索，透过当时处于不同地位的受访人“不堪回首话当年”的感受，叙述他们被卷入政治运动的复杂动机，展现了这代人由最初向往乌托邦社会的革命激情，转变为理想破灭、幡然猛醒的心路历程，探讨了文革的起因、历史背景和对中国人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回顾了四〇年代延安整风、五〇年代大跃进、1976年天安门事件和1980年公审“四人帮”的过程，时间纵横跨度数十年。

片中采访了三个具代表性的家庭，包括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和女儿刘亭、文革期间遭杀害的《出身论》作者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以及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及其女儿李南央。另外还采访了红卫兵运动创始人骆小海、文革中在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见证文革并记录历史瞬间的摄影师李振盛和赵立魁、著名画家黄永玉、学者朱学勤、徐友渔及王力雄等。

“太阳”已于2003年9月下旬起先后在美国华府、波士顿和纽约上映，今年1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放映，将于2月28日下午1时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礼堂放映，届时卡玛将亲临现场回答观众提问。

此片由Long Bow Group制作，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提供主要经费。为了配合“太阳”一片的面世，弥补因片长限制被迫“割爱”的访问内容，“减少良心上的压力”，同时为历史资料存真，卡玛等人设立morningsun.org网站，著重探讨文革（从1964年到1976年）历史，栏目包括“革命生活”、“砸烂旧世界”、“红太阳”、“历史舞台”、“东方红”、“音像多媒体”、“图片”、“文献”等，以多媒体形式呈现文革旧貌，包括大量文革期间的图片、文字资料、声像等珍贵史料；此外还有招贴画、样板戏、革命歌曲、老照片、像章和毛语录等，这些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的文物，就像一座文革博物馆，较集中保存了来自那个年代至今仍未消逝的政治和文化痕迹。

卡玛说，这个网站没有经费和缺乏人手，只好“能做多少算多少”，目前上网的只是部分内容，它一如“太阳”电影，不以编年记事的方式来综述文革，而侧重展示个人故事和家庭遭遇，分析当年红卫兵复杂矛盾的行为，以此来发掘文革这样一个对千百万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内涵。

◇ 令中国人汗颜

许多观看了“太阳”的华人观众不约而同表示，此片的催生和制作者，“竟然是三个洋人！真令中国人汗颜。”也有人发表观后感对卡玛表示敬意：“一个外国女性，扛起沉重的摄影机，挑起本该我们承担的责任，为我们、为他们，为所有八九点钟的太阳，录下这段血腥的历史长河——一部中国的“Schindeler's List”（《辛德勒名单》）。

卡玛1949年12月在北京出生，故有“新中国同龄人”之称，她是极少数“正宗”生长在美国的中国人，也是大陆标准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讲一口带京腔的国语，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除了长著一副白人模样，骨子里非常中国。

卡玛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韩丁。韩丁1953年自大陆回美国后，卡玛与母亲滞留北京，经历了文革，16岁就被人视为“特嫌”，尝尽受歧视的滋味。1971年韩丁成为大陆当局的座上客，获邀访华，卡玛命运得以改变，同年赴美，1976年毕业于宾州大学，后获哈佛大学美术史博士学位，曾任教卫斯理女子学院。目前从事纪录片拍摄工作。

在中国大陆被称为“老三届”的一代人，虽然与美国“婴儿潮”的一代人属同一世代，但他们远不如美国婴儿潮世代“好命”，算是“生不逢时”的一代。他们曾被称为“知青世代”，因为中学毕业时，正赶上毛主席号召奔赴“广阔天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也被称为“文革世代”，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无法磨灭的烙印。

他们曾被捧为“小太阳”，曾经满腔热血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他们本应是幸福的一代。然而，曾几何时，当年如日中天的“小太阳”，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便成了日薄西山的夕阳，成为被残踏和牺牲的一代。

作为在中国特定政治环境生长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中的一员，卡玛有感与自己一样随著文革长大的一代人，命途多舛，从金光灿烂的“小太阳”，逐渐变成西下的夕阳，有些同学朋友甚至中年早逝，她希望在“太阳”们还未落山前，让他们有机会回顾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让外界公正评价这代人的经历。基于这样的动力，继《天安门》后，她再次制作引起同代人强烈反响的纪录片。

◇ “太阳”比《天安门》难得多

卡玛表示，拍摄“太阳”比《天安门》难度大得多，因1989年六四事件前后历时仅56天，且为全球媒体广泛报导，自始至终多角度呈现并且“纪录在案”，资料丰富。但文革音像资料缺乏，仅有的一点资料也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文革至今仍被当局列为禁区，加上文革历时甚久，要想在两小时有限的时间内，完整呈现那个年代的历史事件，“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只能力求藉此打开洞察历史的一扇窗户，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卡玛坦言，最初她“不是很敢拍”这个敏感题材。但在她的丈夫高富贵和白杰明的极力怂恿下，她也觉得“这段历史很重要，应该试一试”。

卡玛等人拍摄“太阳”，事前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下了相当多的功夫，她用“不惜工本”来形容，幸亏争取到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资助，才能如此“奢侈”地花时间、“不要命”投入拍摄工作。

她说，现在人们看到的是两小时的电影画面，但其中的辛苦不足为外人道，光是说服骆小海、宋彬彬等人接受访问，就花费了许多唇舌。在她接触过的相关人士中，许多人“连谈都不愿谈，更别谈在银幕上亮相了”。尤其骆小海此前在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认为对方“不守信用”，由于有过不愉快的经验，他非常抗拒接受任何媒体的访问，后来被卡玛的诚意打动才破例。

“太阳”于2003年9月24日晚在华府“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首映，现居华府的文革史研究学者华新民是当晚观众之一。他与其他几位后来观看过此片的学者，都相当肯定卡玛制作“太阳”的成绩和努力，但也指出片中个别地方的不足之处，总的来说则是“瑕不掩瑜”。

华新民说，电影片名《八九点钟的太阳》，不知道背景的洋人，可能不懂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但对来自中国大陆的观众，用不着解释，谁都知道它出自“最高指示”。那是“伟大领袖”1957年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说的话，当时确实让那个时代的青少年“豪情满怀热血沸腾”……

华新民理解这部电影的宗旨，是要追溯和记录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起源，但并不是为当年整个一代青少年制作，而是以北京几个重点中学里的干部子女为中心，所以里面出现

身说法的人物，几乎都是1966年文革开始时的中学生，他们有的是红卫兵运动发起人，不少是第一批“正宗”的红卫兵。这些人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的那几个月内，是人们心目中最有资格被称为“八九点钟的太阳”的人。毛泽东夫人江青在当时一次集会上，曾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等一千人称为“小太阳”。华新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片名起得很合适。”

◇ 片名语带双关

外界对“太阳”的片名有不同解读，卡玛则解释此片名有“一语双关”之意，既有字面上直接取自“毛语录”的出处，也有“反讽”之意——讽刺毛泽东虽然将年轻人捧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事实上，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只有他一个人是“真正的太阳”。但无论如何，当年毛泽东将“革命接班人”称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虽然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确实鼓舞了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革命热情。

卡玛也不同意华新民关于这部电影“并不是为整个一代青少年制作，而是以北京几个重点中学里的干部子女为中心”的说法，她说此片没有以任何人为中心，不知华新民为何得出上述结论，“究竟这是别人的误读，还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在片中，她试图以个人故事和三个不同家庭为主要线索，如她敬佩的“思想先行者”遇罗克，遇家当时在政治上处于最底层，但遇罗克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出身论》，现在看来仍是“非常了不起”。

卡玛也访问了受迫害致死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她不认为曾贵为国家主席夫人的王光美在片中的地位比遇罗克重要。再如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既是一位老革命，但很早就受到来自革命阵营自家人的迫害，尝到“革命吃掉自己儿女”的滋味。他的女儿李南央受父亲连累，最初苦苦要跟父亲划清界线，最后才由恨转爱，“理解万岁”。

她指出，“太阳”选择上述三个处于不同地位的家庭为主体，就是不要以任何一个阶层人士为中心，而是希望通过不同家庭背景的人士，在某一程度上呈现文革的历史事件。在十多位亮相银幕的受访者中，有些红卫兵迫害过别人，最后自己也受迫害。正应了此片结尾字幕上引用的鲁迅名言：“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

华新民说：“卡玛虽然是洋人，却是长期在中国帮助中共革命美国人韩丁的女儿，她本人就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同这些电影里的人有着同样的成长过程和经历，由她来拍这个电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别的不说，光是请那几个老红卫兵在影片中出场，不属于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就很难做得到。”

但卡玛不认为她跟电影中的受访者是同类人。她说她当时在大陆生活的处境，比出身“黑五类”的子女好不了多少。文革开始时她才16岁，就被当成“特嫌”对待，许多人警告她的同学朋友不要跟她往来，以免受牵连，“没有好下场”。曾有出身高干家庭的老红卫兵，冲着她破口大骂，叫她滚出学校。

她说，当时她结交的朋友，虽然来自不同家庭，但都一致反对“血统论”。有位出身革命家庭的女同学跟她很要好，就被其他干部子女告诫：“你是我们圈子里的人，干什么一天到晚跟那个美国人（卡玛）混在一起。”对方掷地有声地说：“我宁愿当个土八路，也不希罕什么红袖章。”卡玛对那些当时冒着政治风险向她伸出友谊之手的人士，至今心存感激，“那怕别人稍为对我好一点，我这人都特别容易感动。”

卡玛那时与母亲住在北京外文翻译局宿舍，大门有人把守，所有出入访客均要登记姓名才能放行，“那种感觉非常不好，所有来找我的人，都要登记在案。一天到晚都要担心别人受我牵

连。”

她的处境直到1971年才改变。那一年，中美关系处于解冻前夕，北京当局邀请1949年前同情帮助中共革命的外国友人访华，卡玛的父亲韩丁在受邀之列，卡玛的社会地位一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当年跟她划清界线的人，纷纷向她示好，令她五味俱全，深深体会到何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 太阳为何不露脸

“太阳”一片引起较多争议的，是“在银幕上现身却不露脸”的两个当年名噪一时的“红小将”，即红卫兵的发起人骆小海和“八一八”（指1966年8月18日）上天安门城楼给“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观众在电影中只能听到他们谈话的声音，见到他们遮黑了的身影。

宋彬彬在片中辩称：“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为毛主席戴红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当时很多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就到我们学校来看我，但是他们都特别失望，就问你怎么是这么一个样子，你跟我们的想像一点都不一样，就好像你一点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觉得我这个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剥夺了，我自己一点控制的能力都没有，特别地生气。同时我也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地难过。我们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离太远。”

据华新民指出，当晚放映完“太阳”一片后，卡玛在现场接受观众提问，当年小太阳，今天为何不露脸？成了一个重要话题。卡玛的解释是，当事人不愿意以今天的真面目示人。“也就是说，名字已经无可挽回地写进了历史，但他们不希望今天的人们，见到他们真面目时联想起那一段历史。”

华新民据此用了一个语带双关的标题，在网上发表“从太阳不露脸谈起——观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幽了“太阳”们一默。文中质疑宋彬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千呼万唤始出来”，却“勉上银幕犹遮脸”。

“这说明当年那一段历史直到今天仍然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心上。不明背景的美国观众，听骆小海在影片中说，他们当时成立红卫兵的原因，是对学校的领导不满，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他们又听宋彬彬说，她在毛泽东接见后改名为宋要武，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而是报社的记者越俎代庖强加给她的。他们不懂，难道为了这样的事就要采取这种同历史一刀两断的决绝态度？这些提问者有所不知，1966年夏天的那一段历史要远比这复杂得多，岂是电影里的三言两语说得尽的？红卫兵一旦得到伟大领袖的称赞，就不再是你骆小海的教改小组，而成了他老人家手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利器。”

华新民指出，“要武”一旦成为御赐的名字，“就不管你宋彬彬自愿也好，被迫也好，成了千百万‘革命小将’的尚方宝剑。以此为发端，产生了一连串显然不是骆、宋能够预见和控制的事件：破四旧，大串连，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以及‘红色恐怖’笼罩的8月。老舍、卞仲耘、傅雷……这一连串血淋淋的名字，有点自省的人，不能不想到‘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样一句话。这一切，构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这才是他们要同那一段历史划清界线的原因。”

他说，令宋彬彬等人对这一段历史更加不堪回首的是，这一张死者的名单，后来竟然把刘少奇、贺龙、陶铸这样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字也“发展”进去，这就使“小太阳”们对这一段历史的回忆不仅沉重，还交织了受骗上当的难堪和愤怒。

卡玛对此表示，她尽可能核对了宋彬彬的说法，也跟宋彬彬就读的北师大女附中的人了解情况，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宋彬彬不是一个有暴力倾向和会打人的人”。

她说，宋要武的名字传开后，这个名字后来变成红卫兵暴力的一个符号，全国都发生打人事件。1966年从北京到全国各地串连的红卫兵，将这股暴力之风刮到各地，“害了很多”，宋彬彬对此表示难过和委屈。

卡玛认为，参与文革的中学生非常多，对文革的反思是千千万万个参与者的共同责任，如果仅由宋彬彬独自承担非常不公平。何况外界许多传闻并非事实，例如宋彬彬并没有参与打人。她说：“每个人都有其隐私权，即使当年宋彬彬是所谓的公众人物，但她现在不愿意再次成为公众人物，就应该尊重她本人的意愿。”

既然宋彬彬否认当年那篇以“宋要武”之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文章是出自她的手笔，那么，对于这段历史公案，卡玛是否尝试过向光明日报的当事人寻找答案？卡玛说“试了试，但找不到”，她希望对这件事有兴趣的人尝试解开这个历史谜团。

◇ 知耻近乎勇

美国宾州迪金森学院学者宋永毅1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与卡玛一起出席了“太阳”的放映研讨会。他表示，“太阳”是一部成功的文革纪录片，应该鼓励和肯定，但遗憾的是，片中好几位高干子弟如宋彬彬、骆小海等都是遮着脸亮相。反观遇罗文、李南央和刘亭等，都大大方方以真面目示众。卡玛的解释是因宋彬彬等人现在不愿意再度成为公众人物，她只好尊重他们的选择。但宋永毅认为，宋彬彬等人当年早就是公众人物，这个理由似乎难以令人信服。

另外，宋彬彬说她从来没有改过名字，也没有在光明日报用“宋要武”之名发表文章，宋永毅认为这个说法有点“离奇”。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然毛泽东“赐名”，宋彬彬不可能抗命，否则就变成了“抵制伟大领袖”。

在大陆经历过文革全过程的《北京之春》主笔胡平，也对宋彬彬的说辞表示怀疑。胡平指出，这部电影有很珍贵的史料价值。难得的是，卡玛他们找到了宋彬彬、骆小海这样的红卫兵代表人物接受采访，但宋彬彬、骆小海都遮住脸，谈话也带有很明显的自我辩护色彩，其内容有可议之处，“这说明当年发生的事情给他们留下十分浓重的阴影。他们知道自己当年的行为是不光彩的，他们不再把当年那段历史当光荣。知耻近乎勇。”

他指出，文革的残酷，表现之一便是让一些不成熟的年轻人，一下子获得太多太大做错事的机会、诱惑与权力，从而也给后来的他们留下极难克服的精神压力。

至于宋彬彬说，宋要武这名字不是她自己改的，而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擅自改的，胡平说：“也许这是实情。当年的媒体塑造典型常常是这样想当然。但问题是，宋彬彬本人对这个钦赐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态度？是反感还是受宠若惊？”

胡平指出，就在宋彬彬被“伟大领袖”改名宋要武的消息见报后，全国都兴起一股改名风。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都为自己改了个更革命的名字（如卫东、志红等）。宋彬彬所在的北京

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可见当时全校的同学，起码是绝大多数同学，都是为宋彬彬的改名而感到骄傲和光荣。”

他说，很难想像宋彬彬本人对自己被改名字会感到不愉快、不高兴。往后的一段日子，宋要武无疑是全国青少年中最响亮的一个名字。宋彬彬显然很清楚她的新名字具有何等意义，所以她在此后的革命行动中，用的都是宋要武的名字。例如她在南下武汉时，就用宋要武的名字发表声明指点江山。虽然后来她又为自己改名宋岩，“不过，从情理上推测，那应该是他们这批老红卫兵被他们的红司令毛泽东唾弃，其名声由好到坏后的事情。”

现任教芝加哥大学的中国文革史研究学者王友琴，对宋彬彬等人当年的所作所为至今不道歉、不忏悔表示失望。她说，虽然她还未观看“太阳”，但已从好几位朋友口中得知影片的大致内容。为此她与卡玛通了电话，卡玛相信宋彬彬的名字当年是被媒体歪曲利用，王友琴不认同她的说法。

◇ “牛虻”故事贯穿全片

“牛虻”的故事文革前在大陆青少年中脍炙人口。故事的主人公牛虻是一个义大利的革命党人，却被他最敬爱的教父（实际上也是他的生父）出卖，“太阳”全片自始至终贯穿了“牛虻”的故事，并在遇罗文、朱学勤等人现身说法时，多次引用电影《牛虻》的镜头。

片中朱学勤提及电影《牛虻》对他的影响，其中最打动他的是牛虻和他的教父在监狱里面那场对话，这时，“太阳”片中穿插了《牛虻》的镜头：“亚瑟（牛虻）对蒙特里尼（教父）痛彻心肺地控诉：你对人撒谎，说对主暴露秘密可以永远保留，你对主也撒过谎，你曾经起过誓，可是你违背了。”

这时镜头拉回朱学勤身上，他说牛虻对教父的控诉，是希望能够促使教父反省，尽管牛虻知道这种反省是不可能的。朱学勤由此想到自己年轻时接受的革命文化，那时最吸引他的是道德美感。当他像亚瑟那样反省自己受的欺骗和愚弄时，“让我想起我的红衣主教，想起我们自己和党文化的关系。”

这时，“太阳”再次出现《牛虻》的镜头：红衣主教背影穿过一道道监狱铁门走向远处。朱学勤也感受到“像亚瑟和蒙特里尼最后告别的时候那种心理感受，我要目送我的红衣主教远去。”

华新民指出，卡玛在电影中，通过牛虻来表现这种受骗后的愤怒，十分贴切地反映了这些高干子女经历了文革后，产生比一般青少年强烈得多的上当受骗被利用的屈辱感。

他说：“如果说电影把第一批的红卫兵比作受骗的牛虻，那么神父自然就是在1957年给青年们戴上‘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桂冠的毛泽东。”

卡玛不同意华新民的解读，认为“这个说法未免过于狭隘”。她们完全没有将第一批红卫兵特地比作“受骗的牛虻”的意思，隐喻的其实是整整一代人，因《牛虻》曾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卡玛曾调查受访者，影响他们最深的是那几本书？他们均不约而同提到牛虻，如遇罗文就多次提及牛虻对他的影响。更巧合的是，小说《牛虻》的作者伏尼契是卡玛的曾姨母，“似乎冥冥中有某种神秘的联系”。

影片最后的画面以天安门和毛泽东像为背景，配以解说词：

在无数人心目中，革命已死
乌托邦的美景正以新的面貌展现
但毛的幽灵仍在徘徊
每当人们受到压迫并感到绝望
每当异议或抗议被视为非法
毛泽东的身影就可能化为希望的象征
再次激励人们举起造反有理的旗帜

这是导演别出心裁的安排，一方面引发人们对“太阳为何不落山”（毛的幽灵仍在中国大地徘徊）的思考。另外，整部影片也贯穿了当年的“小太阳”历经理想幻灭、精神崩溃之苦后，觉今是而昨非，重新找到人生目标和关怀社会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太阳”也没有落山。

□ 原载《世界周刊》二〇〇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

### 【春秋史笔】

#### 受难者和暴君

• 王友琴 •

在现实世界中，是暴君造成大批的受难者。所谓暴君，是指残酷暴虐的有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残暴和绝对权力，这两个因素使得大规模的杀戮和迫害成为可能。

在历史的写作中，因果关系相反：关于受难者的故事的记载，才使得杀戮和迫害他们的统治者得到“暴君”的恶名。比如，被纳粹党杀害的数百万犹太人的名字和故事，使得希特勒成为人类历史上残暴和邪恶的代表人物之一。比如，由索尔仁尼琴和其他俄国作者揭示的“古拉格群岛”中千万囚犯遭受的虐待和迫害，使得斯大林成为那些想为其辩护者也难以辩护的共产主义暴君形象。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在毛泽东时代被迫害、监禁和杀戮的人们的名字和故事，长久以来，一直被压制和禁止发表。道理很是简单：没有了这些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毛泽东就不会成为历史记载中的暴君。

在我写出的数百名文革受难者的故事中，写得相当详细的一个人物，是文革开始阶段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名叫卞仲耘。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她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50岁，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1966年8月5日，她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殴打折磨数小时后死亡。

我调查并写出了卞仲耘的故事，中国大陆的编辑们告诉我这不会被准许发表。他们说，书籍当然都需要被审查，而关于文革的书籍，还必须特别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查。于是，我建立了一个电脑网站，放置卞仲耘和像她一样的文革受难者的名单和故事。这个网站被阅读流传一年多以后，在2002年3月被北京当局封锁了。

卞仲耘这样的一个人，一个50岁的育有四个孩子的中学副校长，她活着，都不可能当权者构成任何威胁，何况死后。她已经死亡近40年了，她的名字和故事在电脑空间里存在，会对谁不利？为什么需要被封锁禁止？



十分明显，她的名字和故事，以及其他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在今天唯一可能造成的危害，是对害死他们的作恶者的名声的危害。

把这样一个人，一个女人、母亲、中学副校长，用这样残忍的方式，即一群中学生红卫兵的拳打脚踢棒打，折磨致死，横尸操场，这是十分严重的犯罪。而且，这不是卞仲耘一个人的故事。在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掀起高潮的时候，在北京和全国，有一大批中学、大学和小学的教师和校长们，遭到了和卞仲耘一样的命运。

这场红卫兵杀戮，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毛泽东扶植了红卫兵的建立和发展。1966年7月31日，卞仲耘所在中学建立了红卫兵组织，5天以后，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了卞仲耘，打伤了其他一批教职员。

卞仲耘被打死四天以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声称“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卞仲耘被打死13天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会见100万红卫兵。卞仲耘所在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对宋的名字发表评论：“要武嘛。”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该中学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8月18日红卫兵集会之后，红卫兵暴力迅速升级扩大。在北京各中学甚至小学中，红卫兵学生打死了一大批教职员。这种暴力杀戮严重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在我调查过的北京的7所女子中学里面，在8月下旬，有两名教员和三名校长被红卫兵女学生活活打死，还至少有两名教员和一名校工在被“斗争”后自杀身亡。在北京市中心的一所小学“宽街小学”，小学生红卫兵在8月27日一天里打死了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郭文玉的丈夫也被毒打，在两天以后死亡。

除了学校的教职员，红卫兵学生还打死了一大批校外的城市居民。半个月里，在北京有数千居民被打死。同时，有十万人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

北京是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城。由最高统治者发动和组织青少年殴打折磨杀戮教员以及城市居民，把数千人活活打死，在三千年历史上堪数最为残暴的事件之一。对这一事件绝对负有责任的人该当何罪，应该很清楚。

事实上，被红卫兵杀戮的受难者长期不被记载和报告，不是因为暴力程度不严重而不被注意，实际上恰恰相反，是因为太残酷也太邪恶，是因为文革最高领导人的作用太明显，才被长期隐瞒遮盖。

在苏联，斯大林恐怖的丑闻被揭发以后，有人替斯大林辩护说是下面的人做了这些坏事，斯大林本人并不知道。但是，毛泽东显然了解下面正在发生的红卫兵杀人事件。

在卞仲耘被杀害之前，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在暴力性“斗争会”上杀害了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很快当面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卞仲耘被打死的当天晚上，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就当面向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报告了此事。周恩来办公室当晚就派人到该中学了解了情况。

1966年8月22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被打死，副校长董光苔也同时被关在学校中遭毒打。董光苔的母亲通过特殊关系递信给毛泽东请求保护女儿生命。毛泽东接信后批示释放了董光苔一个人。其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仍然被关在学校的“劳改队”里继续遭到红卫兵的殴打折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打死。

同时，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内部”情报系统也逐日向上书面报告当天北京市内有多少人被打死。

这场红卫兵对教师的杀戮，是文革的重要一部分。其理论来源，是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中所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随后发出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里，制定了对文化教育界的攻击部署。就这样，在1966年夏天，教育工作者被指定成为文革的攻击对象，就像1950年代的“地主”和“资本家”，作为一个群体遭到暴力攻击。

在文革时代，1966年8月的红卫兵杀戮被当作“伟大革命”的一部分，被视为红卫兵的革命功劳。1966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各省各部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印发了记录红卫兵功绩的材料《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项，是红卫兵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在那样的文件上，受难者只有数字没有名单，不会是因为要隐瞒他们的被害，而是显示了对他们的生命的轻蔑。

在红卫兵杀戮发生之后，毛泽东自己也对此作过描述。1970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被请到北京参加10月1日的国庆典礼，然后住在北京近两个月等待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和他做了5个小时谈话。在正式印发的谈话记录中，毛说：对于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斯诺在1936年曾经访问延安并对外界对中共作了正面报道，因此被视为中共的朋友。他也许没有懂毛泽东说的拿教员“开刀”是什么意思，他的英文著述里没有写到文革杀人。但是毛泽东是知道的，中国的文革经历者也是知道的。真的就是“开刀”，就是杀人见血。

人类的历史上有过各种暴君。毛泽东所作，有的只是沿袭以前的暴君的做法。比如，希特勒杀害了几百万犹太人，一位学者发明一个新词，*genocide*，来描述这种对一个群体的迫害和杀戮。在这种迫害和杀戮中，惩罚或杀害一个人，不是由于这一个人做了什么，而是由于这个人属于一个种类或者群组。文革中，卞仲耘之死和千千万万教育工作者被毒打被折磨甚至被杀害的故事，就属于同一种迫害和杀戮，而且非常典型。笔者十多年来查访了全中国几百所学校，没有发现一个学校在文革中没有殴打侮辱折磨老师，也没有发现一个校长没有遭到野蛮“斗争”。他们被殴打，被剃“阴阳头”，被“劳改”，被管“牛棚”，被迫写“交待”和“检讨”，甚至被活活打死，就是因为毛泽东把他们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类别，并对这个类别进行整体性的迫害和杀戮。

现在从电视纪录片上可以看到，1930年代斯大林“肃清反革命”时，预先就制定了各地区要逮捕和枪毙的两类人的名额数字，并打字印刷出来。在纪录片上，还可以看到斯大林的亲笔字条，内容是要俄罗斯的一个州增加枪毙6千6百人。这种随心所欲写出的杀人数字，不能不令人震动。只有暴君，才既有这样的残暴心肠又有执行落实残暴理念的巨大权力。这些显然都是罪恶的证据。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中国的这一类内部材料，但是，这种预先制定数字进行迫害或者杀戮的做法，仔细阅读大量印行的《毛泽东选集》和其他公开发表物也就可以看出。和斯大林稍有不同的是毛泽东喜欢使用百分比。在文革中，是所谓“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195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划出的“右派分子”的人数，和《毛泽

东选集》第五卷中有关文章提到的百分比是一致的。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中，毛泽东写了“各地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这段话的后一半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时候（1977年）被删去了，显然是因为这个百分比背离法律太远和残忍得太露骨，但是杀人有“比例”却仍然保留了下来。

在迫害和杀戮方面，毛泽东最有特色和原创性的，应该是他的“群众专政”思想。文革中这一短语因为被频繁使用，一度被缩略为“群专”。毛泽东在使用军队、警察和监狱这些“专政机器”之外，他发动和领导普通人大量参与对“专政对象”的虐待和杀戮。比如，红卫兵和类似的“群众组织”，在文革头三年的杀戮和迫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66年8月在北京的杀戮，主要就是由中学生红卫兵来执行的，警察和法院起了辅助作用。卞仲耘等一系列教育工作者，完全是被他们昔日的学生，那时的红卫兵，打死打残打伤的。这种利用青少年杀人的做法，后来被“红色高棉”所继承。

“群众专政”的方式，在1966年红卫兵运动兴起高潮之时，主要是暴力性“斗争会”。“斗争”是一个意思不明的动词，文革中这不但意味着遭到不经任何法律程序遭到指控和判决，而且可以是侮辱，体罚，毒打，直到当众打死。“坐喷气式飞机”（即把被“斗争”的人按倒头部，反扭双臂，成飞机形状），胸前挂写有侮辱性罪名的大牌子，戴“高帽子”，剃去半边头发成所谓“阴阳头”，游街，无处不见。红卫兵装束中的铜头军用皮带，也是抽打被“斗争”的人的方便而富于杀伤力的工具。

在1968年，“群众专政”的主要形式是“牛棚”的普遍建立。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全中国每一个工作单位都建立了自己的监狱，关押监禁本单位的工作人员。这种监狱后来被俗称为“牛棚”。从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到远离北京的乡村小学，都建立了这种监狱。这些监狱的狱卒就是那个单位的一些工作人员，在学校，学生成为狱卒的主要成员。共产党高级干部在1967年以后也大批遭到“罢官”和监禁，他们被监禁在特种监狱像秦城这样的地方由专业的警察看守。而一般老百姓中被“揪出来”的所谓“牛鬼蛇神”们，就监禁在遍布全国的无数大大小小的“牛棚”之中。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京大学有24人迫害致死，在卞仲耘的中学有三名教员受迫害而自杀，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62%的1949年前入厂的老职工被“审查”，14名老职工被迫害致死。在北京市，“揪出的各类阶级敌人”有80,100人，其中有3,512人自杀，219人被打死。

希特勒和斯大林没有试图或者也做不到在每一个工作单位或者居住社区建立这种“牛棚”，使得每一个人，如果不是被“斗争”和被监禁，就必须成为“斗争”别人的助手和帮凶，至少也得在“斗争会”上跟着众人挥拳头喊口号。文革不给人充当旁观者的空间。毛泽东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得迫害深入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一方面腐蚀了无数人的灵魂和摧毁了他们的道德底线。尤其那些充当主要打手的人们，甚至在文革之后甚至在今天，很多这样的人在毛泽东精神遗产的庇护下，并没有忏悔和内疚的感觉。

希特勒和斯大林并没有留下很多他们具体指导如何进行迫害和虐待的文字，但是，毛泽东留下了一系列指导施行迫害的文字记录。比如，在1968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泽东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在这份毛泽东称赞的“经验”中，详细介绍了召开“斗争会”和整人的各种细节。在其他场合，毛泽东也写一些“批示”，显示出他对迫害人的具体手段方面的关注和兴趣。他甚至相当自我欣赏地发明了一个专门名词，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说法给一个人数巨大的青少年群体带来了长期的歧视和磨难。

如果贴近去看文革迫害和文革受难者的遭遇，会使得人们看清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文革部署和策略，也看清他个人心理的阴暗和狠毒。他的最后十年，毫不留情地清洗和害死了两名最高权力圈子中仅次于他的第二号人物，也杀死和迫害了无数的普通人，如中小学教员，还有被迫害的人的年幼子女。毛泽东的名字，和太多的受难者连在一起。

毛泽东在1976年死去。他死去两年之后，新的领导人小心谨慎地开始给文革中被戴上各种罪名以及被害死的人“平反昭雪”。举行了一系列的“骨灰安放仪式”，虽然仪式上的大量骨灰盒子都是空的，因为受难者根本没有被准许留下骨灰。大批当年给教职员定罪用的档案材料被烧掉。北京第八中学烧掉了整整两大麻袋纸片，别的学校也类似。此外，一千万被送往农村“再教育”的城市青年终于被准许回到父母身边。

这场“平反”还一直延伸进1957年甚至更早的时期的迫害。“右派分子”都得到了“改正”。大批的人从监狱和劳改农场回到家中。一些在1950年代初就被枪毙了的人的家属，也收到了给他们死去多年的亲人“平反”的通知书。这个情况，很像在斯大林死亡后，赫鲁晓夫对大批劳改营中的囚犯所作的。如果斯大林或者毛泽东不死，这种“平反”是怎么都不可能发生的。

在1979年前后发生的，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平反”活动。有数千万人得到了各种平反。应该指出，邓小平和胡耀邦，在这场“平反”中有非常大的功绩。也应该指出，这场“平反”的人道主义功绩之所以那么大，首先是因为在此之前的这场迫害和虐杀的规模太大。

但是，邓小平和胡耀邦在给千千万万受害者“平反”的实际行动的同时，也立即制造了一套关于迫害和虐杀的“理论”，也就是一套“解释”。他们的理论主要有两点。

一点是，文革的罪责被归结给林彪和“四人帮”。在所有的文革后发出的正式“平反”文书中，千篇一律地写有“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林彪和四人帮当然对文革中千万人的悲惨遭遇负有极大罪责。但是，他们在文革中的角色只是毛泽东的副手即帮凶。这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却从来没有人能公开谴责这一点。多年来人们一直只有听任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的实际意义，是分割开了毛泽东和受难者的关系，摆脱了他的罪责。

另一点是，他们把文革对人的大规模的迫害称之为“冤假错案”而予以“平反”。“冤假错案”是正常司法制度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是大系统中的失误的个别例子。文革受难者的死亡却不是偶然的意外事故。文革中发生的是有理论有设计有组织的迫害，受迫害者是一些很大的被预先指定的群体，迫害者则是掌握了最高权力的政党、政府和军队的统治者。1966年8月打杀教育工作者的红卫兵暴行，能用“冤假错案”的说法来诠释吗？这种说法可以缩减整体文革的罪恶，同时涂白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罪责，首先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罪责。

实际上，邓小平和胡耀邦在“平反”中并没有真的把那些案件当作“冤假错案”来改正，他们也当然不会相信文革只是林彪和“四人帮”的罪恶。他们只是从他们的政治计划的需要出发这样说，并利用他们掌握的宣传工具反复这样的两个理论。至于中国的普通人，长期生活在食品匮乏、服装破旧、住房缺乏的贫困之中，生活在害怕被当成“反革命”“阶级敌人”被“揪出来”“斗争”的恐惧之中，生活在一千万青年人被迫离开父母远去农村的无助绝望之中，总算等来了毛泽东的死亡以及因此发生的生活转机，不能不用阿Q精神来看待这样两个新谎言：只要能改变文革的做法就好了，对怎么解释文革何必费心呢。再说，老百姓也绝无权利在报刊上发表不同意见。

由于看到斯大林虽死但是其影响犹在，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写过一首诗说，要检查检查斯大林的坟墓里是否有一架电话，半夜里他还在那儿发号施令。中国的情况不同。毛泽东不需要暗连的电话。毛泽东的尸体供奉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的巨幅画像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威力直接使得受难者们的名字成为禁区，不能印刷在报纸杂志上，也不准展示在电脑网络空间中。

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当暴君不予受难者安息之地的时候，应该让他安息吗？

所谓“暴君”，是一种老式的说法。在现代的司法正义体系中，这种人应该是罪犯的一种，是“群体灭绝罪”的罪犯之中的主犯，一种因其有大权力而犯下大罪恶的特种罪犯。在千万受难者和一个暴君的对立中，虽然现在仍然是暴君占据了权力的上风地位，但是在历史和道德的法庭上，罪犯终将被审判。

□ 原载《观察》网站（1 / 17 / 2004）

~~~~~

【历史资料】

关于林彪的几个问题

• 聂荣臻 •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我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林彪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妄图谋害毛泽东同志，阴谋败露，驾机叛国，折戟沉沙，葬身在温都尔汗。知道事件真相的同志，大多在想，象林彪这样一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又是从大革命时期就来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怎么会走上这条罪恶之路呢？这确实是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认清林彪的本质，也必须联系他过去的历史，还他以历史的真实面目，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在当时，不仅绝大部分青年人和中年人不清楚林彪的历史真相，即便是参加过红军的老同志，知道林彪真实历史的也为数不多。有鉴于此，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确定，从九月二十六日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老同志座谈会。先后参加会议的有：李富春（主持会议）、陈毅、徐向前、邓颖超、蔡畅、王震、张鼎丞、张云逸、邓子恢、曾山等十多位老同志。会议开了二十多天，系统地揭露了林彪历史上的种种问题，分析了他的丑恶本质。我和林彪几经共事，就所知道的情况，在会上也作了几次发言。这次老同志座谈会，对帮助人们认清林彪的本质，起了良好的作用。

◇ 战争年代林彪的问题

我认识林彪，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他当时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我同他没有多少接触，印象不深。林彪到叶挺独立团不久，就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后又随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并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直至红四军军长。据朱德、陈毅、肖克、曾山、邓子恢等老同志谈，这一时期林彪就有许多严重错误。他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转战到湘南大余，他动摇离队，只是由于不认识路，才不得不折回部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环境困难时，他多次要求离开主力去打游击，甚至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一九三〇年一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就是为批驳林彪的悲观动摇而写给林彪的一封复信。在作战时，林彪又经常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擅自行动，置别人的安危于不顾。他当团长时的团党代表何挺颖同志，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后，林彪扔下他不管而牺牲的。

在战争年代，我同林彪先后共事三次：第一次是红军时期，前后达四年之久；第二次是抗日战争初期，只有约两个月的时间；第三次是进行平津战役的时候，也只有两个来月。三次共事合起来虽然不到五年的时间，但却也贯串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严酷的斗争考验，使我初步认识了林彪其人。我对林彪是有个认识过程的。开始接触，我觉得他比较年青，世故不多，但不久就发现林彪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他不认为红军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指导和红军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往往夸大自己的作用，把荣誉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我刚到一军团，就发现他口袋里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些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他那种沾沾自喜的样子，给我留下了不良印象。此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两年半多的征战中，我一方面看到他打仗还行，有时候有股子猛劲，有时候对战术问题也肯动脑筋。另一方面，也发现了他品质上有重大毛病，前面我在回忆录中已经说过了，如在漳浦筹款时违反政策，发表《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搞政治投机。这些都引起了我对他政治品质的警惕。但林彪当时才二十七岁，性格基本上是内向的，平时不大讲话，与他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很困难；又是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环境特别困难的时期，党内领导层的斗争情况也很复杂。团结对敌，度过难关，这是大局。所以我没有再从坏处去想他，也没有同他交换意见。

在艰险异常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林彪政治品质上严重的个人主义，自以为是，只顾自己，不顾大局，目无组织纪律，在大是大非面前投机动摇等问题进一步暴露，我不得不同他进行了必要的斗争。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平型关战斗以外，我同他接触不多。延安整风时，贺龙同志的爱人薛明同志曾揭发：叶群政治上可疑，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但是在林彪的包庇下，以后没有再审查下去。“文化大革命”中，叶群为林彪出谋划策，出了许多坏点子。这也是促成林彪野心膨胀的原因之一。

进行平津战役的时候，林彪出于本位主义，一再违抗毛泽东同志迅速进关的命令。毛泽东同志对第四野战军领导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实际上是批评林彪），可林彪又故伎重演，迫使罗荣桓同志作了检讨。罗荣桓是位很讲原则的同志，经常对林彪的错误有所抵制，林彪就对他非常不满。平津战役结束后，林彪甚至向我提出不要罗荣桓同志当政委，要我去当第四野战军政委。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我当即坚决拒绝。总起来说，我对他的错误作过一些斗争，但在当时，我所抱的态度是，除了原则分歧以外，为了党的事业，作为同事，应该支持他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多次听说他对自己的健康疑神疑鬼，长期小病大养，我是有看法的。但“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他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一九五九年八月以后，他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对他总是往好处想得比较多。

林彪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地暴露出来了。我们一些老同志同林彪之间，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上，都是有原则分歧的。但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对他被指定为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一是看到毛泽东同志虽然经常批评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高度尊敬和信任，我们也就往好处想，认为林彪比较年轻，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教育，可能已经认识、改正了错误。既然如此，我们如果再翻林彪的老帐，也就不好了。二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被排在毛泽东同志之后的第一名，这就事实上确认了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如果说三道四就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了。但实际上，林彪的极端个人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相反，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他的个人野心恶性膨胀起来，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后来竟图谋杀害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四

人帮”勾结起来，干出了数不清的罪恶勾当。下面我只谈几件同我自己有关的事情。

◇ 所谓“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就是指的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同志。所谓“杨余傅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实现篡党夺权阴谋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冤案。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个是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个命令是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由于林彪别有用心和有意封锁，以致军队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都毫无所闻。至于这一事件何时策划，怎样酝酿的，那就更是不得而知了。林彪在关于“杨余傅事件”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件事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了，开了四次会才决定下来。可见林彪是早有预谋的。

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机关部队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林彪在会上讲：“……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林彪还造谣说傅崇碧同志带着几辆满载全副武装的汽车冲进“中央文革”驻地去抓人。他们还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在大会前两天，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即被拘留监禁，以后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杨成武同志一家先后被整死了三口人。三月二十四日的大会我没有参加，因为三月八日我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搞了六十多个小时才恢复正常。当时我住在西山，他们打了三次电话，让我去参加大会。我说，身体实在不行，只能请假。会议情况是叶剑英同志回来后告诉我的。会上，林彪一伙作了精心安排。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同志都是政治局委员，但统统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坐，一律坐在台下。别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却坐在台上。很显然，意思就是台下这些同志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的对象。尤其意味深长的是，林彪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又说了一通晋察冀只是解放军的一部分，意思是说杨成武在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林彪讲话以后，康生接着讲话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他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就是要挖出晋察冀的“黑后台”。那我当然是首当其冲了。在林彪、“四人帮”等一伙的煽动下，社会上掀起一股要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这些老同志统统打倒的邪风。林彪策划的这一套，已经使他制造“杨余傅事件”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了。第一、排斥异己、安插亲信，首先把军队的大权转移到他的亲信手里，为篡党夺权铺平道路。第二、借此打倒一批他们想要打倒但还没有被打倒的老同志，清除他们篡党篡军的障碍。

当我得知这些情况以后，感到问题是严重的。果然，从四月一日起，应该发给我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我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四月六日，我给叶群打电话问：“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叶群在电话里说：“并没有点名嘛。”她没有说黑后台就是指我，但也没说我不是黑后台。当时社会上“炮轰聂荣臻”轰得很厉害。叶群的意思是，反正外面在轰，让人家轰嘛，轰倒谁就是谁。四月七日，我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同志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信上我还要求同毛泽东同志面谈一次。四月十日，周恩来同志着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在我写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听了这个批语，我已经明白，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意思。不久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当面对我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四月十六日，我到林彪那里去了一趟，我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勉强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意思是不大听话了。我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当时我感到非常可笑，这也竟然成为被打倒的理由，说明他们一手策划的“杨余傅事件”是根

本站不住脚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是林彪搞的。一九七四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又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此后不久，他们被释放出来，并先后恢复工作。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央又发出专门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联系到“杨余傅事件”，有必要提及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对和批判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使许许多多的干部受到迫害和不公正的待遇。它的流毒很广，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尤其对党内团结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从林彪开始整杨成武的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到一九七一年初，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大整郑维山同志，说什么“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还诬蔑我“从一九三七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九一三”事件以前，“四人帮”说“华北山头”是反对林彪的；“九一三”之后，一夜之间，忽然又说“华北山头”是紧跟林彪的，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当然，这些已经都是历史的陈迹，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党中央已经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门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问题澄清了，但是林彪、“四人帮”长期以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是很难一下消失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地狠整所谓的“华北山头主义”呢？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北京军区的地理位置重要，是首都的所在地，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就首先要将北京军区的军权夺到手，才能够放心。事实上，我自从不兼华北军区的职务以后，从来不过问军区的工作。至于在军区工作的一些老部下，有时候来看望我，这是有的，但我从不向他们交代军区工作应该如何如何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始终是这样做的。北京军区机关华北的干部（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多一些，这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我想，其他军区的干部状况也大体如此。问题不在于哪个地区的干部多少，而要看他们是不是真在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我相信，北京军区所有原华北地区的干部是能够识大体顾大局的。我希望，北京军区的所有干部，不论是原来的还是后来的，都不应该有宗派主义，要特别注意团结好；在党中央和军区党委的领导下，要搞五湖四海，把北京军区建设好；用实际行动来肃清林彪、“四人帮”长期散布的流毒，来回击林彪、“四人帮”一伙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诬蔑。

◇ 所谓“二月逆流”

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很明显，这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又一起大冤案。这一事件的主要标志就是所谓“两个大闹”，一个是“大闹怀仁堂”，一个是“大闹京西宾馆”。当然，这两个所谓“大闹”，只不过是这场矛盾的爆发点而已，在这以前还有个酝酿过程。当时我们这些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认为是错误的，如红卫兵搞大串联，把正常的社会秩序搞乱了；到处号召人们“造反”，工厂、农村的生产日益下降，甚至停顿；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尤其是林彪、“四人帮”对老干部一个一个都要打倒，这些老干部是与我们共同战斗过来的，互相了解，诬蔑他们是叛徒特务，我们是绝不能同意的。后来，林彪、“四人帮”又把“文化大革命”的火引向了军队，企图把军队也搞乱。对红卫兵小将，先是利用他们把水搅混，又反过来整他们，定为反革命，不少人被抓了起来。在他们的挑动下，全国各地武斗频繁，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严重。祖国处于危难之中。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面对这些问题，

不可能不深思、焦虑，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担忧。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开始，为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在这个会上，老同志们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二月十六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怀仁堂碰头会的会场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周恩来同志主持会议，当然每次都坐在会议桌的头上。我们几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同志和我等，经常很自然地坐在桌子的这一边。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所谓“文革派”成员也自然地凑到一起，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真可以说是“两军对垒，阵线分明”。

早在二月十六日前几天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同志对坐在对面的陈伯达等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工厂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同志也激动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李富春同志因为协助周总理抓生产等日常工作，经常找一些副总理研究情况，康生当面诬蔑他是“反党俱乐部主任”。富春同志说，我再不抓，对周总理的压力更大，你们既然这么讲，那就组织专案审查吧！我在会上也对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二月十六日下午，恩来同志再次在怀仁堂召集碰头会议，原定计划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当谭震林同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他们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同志时，张春桥托词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谭震林同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谭震林同志说完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当时他的确很激动、很坚决，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陈毅同志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有些人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反对主席。斯大林死后不久，赫鲁晓夫就篡了权，他上台，还不是大反斯大林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的。这些话很明显是影射林彪的，刺到了他们最痛的地方。余秋里同志也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的所谓造反派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同志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恩来同志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碰头会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当天把老同志们的发言和会议情况整理了一个记录，上送告状。两个月以后的四月份，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因为再一次讲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文件被抢走等等情况，大家非常气愤，有的同志拍了桌子。这就是所谓的“大闹京西宾馆”。从那以后，我们这些老同志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煽动和操纵各种群众组织，对老同志们每天都在打倒、炮轰、纠缠，使你无法进行正常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不能发挥作用。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这中间还出现了一个插曲。有一次康生在会上讲到“二月逆流”时说，“二月逆流”打急先锋的，现在讲是谭震林，实际上不是谭震林，是叶剑英。叶剑英讲“不教而诛”，直接拉开了斗争的序幕。叶剑英同志听了感到奇怪，他对我讲，我没有讲过“不教而诛”呀。我说，“不教而诛”是我讲的嘛，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去了。以后我向中央写信，作了澄清。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四人帮”一伙看到有些老同志虽然靠边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打而不倒，轰而未垮，而且还有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保他们，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在毛泽东同志面前不断告状，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而毛泽东同志就是不说这些老同志可以打倒。这样，林彪、“四人帮”一伙就认为老同志仍然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重大障碍。所以，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们串通起来，有计划地对老同志发动了总攻。经过精心安排，老同志被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林彪的一伙，“四人帮”和陈伯达、康生等一齐出动，在各个组煽风点火，出点子定调子，对老同志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大搞逼供信。他们造谣诬蔑，无中生有，捏造出了许多所谓“事实”，硬是把我们将“反党集团”纲上拉。我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那个小组，组里成员大多是历史上同我共过事的老部下。他们这样安排，用心是非常恶毒的，一方面可以挑拨我和这些同志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简报的份量，这些老部下揭发的材料不是更可靠吗！实际上简报中他们塞进了许多私货，同志们在会上除了一般表态以外，没有揭发什么。此外，如果哪位同志不积极揭发批判我，还可以对他们记上一笔立场不坚定的帐，真可以说是一箭三雕。别的老同志在会上的处境，也跟我大体差不多。陈伯达在会上气急败坏地追问我，为什么背后议论他那段“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的历史，摆出了要报一箭之仇的架势。他心里有鬼，他的福建话别人又听不懂，咕咕嚷嚷，我根本没有理他。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十月二十六日的全体会议上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说：“在运动过程中，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干扰这条路线的‘左’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林彪接着就反咬一口说：“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连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林彪还说：“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林彪的这次讲话很长，上面这几段是它的核心。他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是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政治动员令，也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以后大会小会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他的这个基调进行的。但是毛泽东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闭幕会上的讲话，与林彪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同志说，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欺骗蒙蔽毛泽东同志的结果）。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乎多过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节目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罗。事情很明显，林彪是千方百计要打倒这些老同志。毛泽东同志因为受了蒙蔽，虽然也批评这些老同志，但他讲话的精神，是肯定老同志们的行动是“阳谋”不是“阴谋”，是内部矛盾。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在向下传达的时候，林彪、“四人帮”一伙编造了一套谎言，硬把我们说成是所谓的“反党集团”。除谭震林同志已经被他们整倒，说我们六个人分成两个摊子，一摊是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一摊是叶剑英、徐向前和我。还说李富春是牵头的，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说我们这些人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等等。十二中全会开完不久，我就病倒了，得了肺炎，发高烧，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有一天，叶剑英同志到医院来看我，他

们不让见面。后来他打电话给张瑞华说：“你转告聂老总，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那时候刘伯承同志的眼睛还能看到一点，在医院见了我也说：“老兄呀，这下你苦了，给弄到反党集团里面去了。”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老战友们的这些话，感到是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一九六八年底，周恩来同志看到了一份反映老同志思想动态的简报，以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同志在这份简报上又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对老同志们采取了保护措施。可是林彪一伙仍然阳奉阴违。一月五日晚上，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和吴法宪带着上述批示来给我传达，接着也传达了林彪的所谓批示：“坚决拥护主席批示，派黄永胜、吴法宪两同志传达主席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所谓“新的障碍”，这明摆着是一种警告。更有甚者，他们还规定对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上述批示，要严格保密，不准往外透露。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同志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这样，也就等于中央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这就是“二月逆流”的始末和主要情况。从中也可以看出林彪的野心和为人的阴险。

◇ 所谓“第一个号令”

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他的“号令”内容包括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并迅速报告。十月十八日，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十月十九日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企图先斩后奏，以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同志同意。毛泽东同志听了，当即指示：烧掉。意思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把这个“号令”烧掉。林彪和黄永胜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他们还扣发和删改了某些军区关于执行这个“号令”的报告，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进行封锁。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的是看看他这个“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接着，他们发出通知，要这些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马上离开北京。他们通知我疏散到郑州。我表示，既然是战备嘛，郑州那个地方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我也不熟悉，还是到河北省，晋察冀这些地方我熟，如果打仗，还可以起些作用。后来决定让我到了邯郸。这次疏散，老同志们基本上是在京广线上。陈毅同志到了石家庄，徐向前同志到了开封，刘伯承同志到了汉口，叶剑英同志到了长沙，朱德和李富春同志到了广州从化。规定我们不能离开所在的城市，不让回北京，也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这实际上等于软禁。象朱德同志所在的从化，里面风景很好，但是以一座桥为界，不准他越过一步。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到了邯郸。我在邯郸还好，住在一个招待所里，隔墙就是公园，我几乎每天到公园去散步。那个地方很多同志是我的老部下，对我客气得多。到了一九七〇年二月份，我得了皮肤病，痒得不

能睡觉，从北京搞了些药也不见效，只好报告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很快同意我回北京进行治疗。当年五一节，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我，问我身体怎么样。当我告诉他病情以后，他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通过这次治病，我一方面感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对待老同志的关怀，同时也发现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意思。我回北京并没给林彪和“四人帮”打招呼，是直接给恩来同志报告的。

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老同志是极其残酷的。陈毅同志便血，要求回京治病，竟遭拒绝，耽误了他直肠癌的诊断治疗时间，后来也是恩来同志同意后才回北京的。徐海东同志有严重的肺病，时刻离不开氧气，竟被逼着去郑州，结果还没有到那里，人就不行了。刘少奇、陶铸等同志也都是在同期被赶出北京折磨而死的。

因此，林彪的所谓“第一个号令”，也可以说部分地达到了他的可耻目的。林彪历来是十分重视军权的，他把军权称作是“权中之权”。“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林彪同黄永胜谈话，讲到军队的作用时，他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所以林彪拚命地在军队中到处安插死党，培植亲信，妄图把军队变成他的御用工具。他在总参安插了黄永胜，在空军安插了吴法宪，在海军安插了李作鹏，在总后勤部安插了邱会作。这些死党唯林彪之命是从，干了许许多多的坏事，给军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他们在群众中制造分裂的流毒，有些至今没有完全消除。

从以上历史事实可以看出，林彪最后变成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和阴谋家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他长期坚持剥削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结果。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这种思想不但没有得到克服和改造，反而越来越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发展成为野心家，最后成了党和祖国的叛徒，以致自取灭亡。这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林彪事件，作为历史的一页，我们也有许多值得记取的教训。

首先，对于个人主义严重，特别是伸手要官要权的人，我们不应该予以重用，尤其是决不能让他们进入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我们一些老同志，包括我自己，对林彪的老底还是知道的，但往往从好的方面想得多，认为他还是为党做了些事情，人比较年轻，错误可能已经改了，这样，就放松了对他的一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品质的警惕和斗争。到了“文化大革命”，多数老同志已经看清了林彪的野心在不断地恶性发展，但那时我们已经处在无能为力的境地。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他要抢班夺权的野心不断有所流露。特别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要当国家主席，与陈伯达勾结，编造所谓“论天才”的语录，指使他的死党一齐出动，大闹庐山。这件事，林彪的个人野心暴露得再清楚不过了。可惜，当时毛泽东同志虽然对林彪、陈伯达一伙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斗争，但对林彪没有采取断然措施。结果，被林彪钻了空子，以致酿成了“九一三”事件。

第二，我们必须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识别混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两面派人物。全国解放以后，林彪小病大养，实际上却在那里窥测方向，后来见时机到来，就投人所好，用两面派的手法，以“左”的面目，装作拥护毛泽东同志。例如，他宣传什么“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提出什么“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开展“四好、五好运动”等等。他又善于造谣惑众，陷害同志，往往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我们许多同志对林彪的这些假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容易上当。其实，今天看，他提出的有些东西，只不过是“左”倾空谈，空头政治而已。他的真正用意，还在于用这些两面派手法，力求获取信任，以实现他攫取权力的野心。口号叫得山响，实际行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忽“左”忽右，完全违背“实事求是”的党的根本原则，对于这样的两面派人物，今后我们仍然要有高度的警惕。

第三，我们要警惕象林彪那样极力鼓吹个人迷信的人。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林彪就鼓吹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制造个人迷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也就是大家称之为“政变经”的那次讲话）中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三个月以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说：“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完全践踏了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是他第一个喊出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口号，以后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他又多次重复。这四个“伟大”，连毛泽东同志自己听了也觉得很不舒服，要求纠正。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他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中还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这是完全违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革命领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实践向他们提出的历史任务。时间、地点、条件不同，怎么能够硬把他们拉在一起作互相比较呢！林彪的这些所作所为，用意何在，“九一三”事件已经作了最好的说明。我们党应该坚持不懈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今后，我们仍然应该警惕鼓吹个人迷信的人，防止象林彪一类的政治骗子，再度危害我们的党。

林彪自取灭亡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续阴谋篡党夺权，为非作歹，干了大量的罪恶勾当。一九七六年四月，波澜壮阔的天安门事件，是对“四人帮”的一次群众性声讨，结果遭到了法西斯式的疯狂镇压。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病重和逝世前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达到顶点。全党和全国人民无不感到极大的愤怒，忧心忡忡。我也和大家一样，为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担忧。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杨成武同志来看我，他谈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重形势。我把我的担忧心情也向他说了，要他马上到叶剑英同志那里，转告叶帅：“‘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分，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成武同志当即就去了叶帅那里，回来对我说，叶帅与我有同感，他想的和我想的是一样的，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马上找有关同志商量，采取行动，并立即搬家，以防意外。十月五日，叶剑英同志又要成武同志告诉我，已经商量好了，要我放心。十月六日晚，终于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我的回忆录，写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用血的代价挖出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当时党的某些负责人，却继续陷在“左”倾错误的泥潭里不能自拔，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这样，就必然无法纠正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左”倾错误，也无法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散布的大量流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拨乱反正，使我们重又一步步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里面，邓小平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对我国历史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都作了全面正确的阐述，这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文选”里面。因此，《邓小平文选》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认真地学习它。在结束我的回忆录的时候，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我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全国人民和我们的军队，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我相信，在革命的征途中，不管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中国共产党人人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终将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得最后的胜利！

□ 摘自《聂荣臻回忆录》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